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 
**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Japan**

**授课教师**包霞琴 教授

**助教**王龙升

**目录**

[第一讲 日本战败与“维护国体论” 2](#_Toc191567577)

[一、何为“大东亚战争” 2](#_Toc191567578)

[（一）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战略思想 2](#_Toc191567579)

[（二）“大东亚共荣圈” 3](#_Toc191567580)

[二、“维护国体论” 3](#_Toc191567581)

[（一）稳健派登场 3](#_Toc191567582)

[（二）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投降 4](#_Toc191567583)

第一讲 日本战败与“维护国体论”

2025.2.27

一、何为“大东亚战争”

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在日本有不同的说法，如“15年战争”“太平洋战争”等，而当时最流行的“大东亚战争”的称呼，其思想渊源是“大东亚共荣圈”。而要了解这一思想渊源是如何形成的，就要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思想。

（一）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战略思想

1. 明治维新

在明治维新之前，德川幕府统治着日本，即江户时代。当时的德川幕府采取了“锁国”政策，既不与外界进行贸易来往，又断绝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。1853年，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舰来日，即“黑船事件”，打开了日本的国门。1854年，《日美和亲条约》签订，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。1854年至1859年，日本又与法、荷、俄、英签订了《安政五国条约》，同样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。在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就是与西方列强修改这些条约，直到1900年这些不平等条约才或修改或废除。

面对列强的威胁，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了两种对策：一种是“尊王攘夷论”，要求推翻当时实权统治的德川幕府，实现王政复古；这一论调最终导向了明治维新；另一种是“开国论”，即主动开国，与西方各国协调，向西方列强学习。在明治时代的前期，“开国论”占了主流，日本开始在政治、经济、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西方学习，甚至达到了“崇洋媚外”的地步。

2. “脱亚论”与“兴亚论”

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开始学习西方，逐渐形成了西式的议会、政党、宪法等。但日本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天皇，因而宪法也与西方各国有较大不同。近代以后，“兴亚论”和“脱亚论”是最主要的两大思潮：脱亚论主张“脱亚入欧”，强调与西方列强相协调，共同侵略亚洲国家；兴亚论主张“大亚洲主义”，强调“亚洲连带”，认同东方文化，团结合作共同抵御西方，由日本作为亚洲盟主，与西方列强抗衡。亚洲主义是一种思想与行动的总称，与东亚各国民族危机和民族觉醒相联，在不同时期有特定的内容与含义。

1885年，福泽谕吉撰写了《脱亚论》，主张“脱中国化”，是脱亚论的代表；他认为，在西方列强主导的“适者生存”世界，从中国而来的儒家思想已不适用，只有强化自身才能博得世界上的一席之地。脱亚论也是当时日本官方采纳的思想。1893年樽井藤吉的《大东合邦论》则是兴亚论的代表，他本人在之后也创立了“东洋社会党”，但影响力没有脱亚论大。

在这一时期，虽然脱亚论是主流，但日本也涌现出了各类兴亚论的组织机构，如“振亚会”“兴亚会”“东亚会”等。其中，1898年由近卫笃麿建立的“东亚同文会”还接受了政府的补助金。一些兴亚论的组织还与孙中山的同盟会联系密切，希望同盟会在推翻清王朝后再来改造日本。在这一时期，亚洲主义还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。

1894年至1895年，中日甲午战争后，日本成为拥有殖民地的亚洲国家，日本的中国观发生本质性变化，“日本盟主论”甚嚣尘上。这一时期，“日本盟主论”的代表作有内村鉴三《代表性的日本人》（1894）、新渡户稻造《武士道》（1899）、冈仓天心《东洋的理想》（1903）《东洋的觉醒》（1904）等。甲午战争后，日本占领了辽东半岛，但随后在三国干涉的压力下被迫归还，当时的日本将此视为耻辱，为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。日俄战争后，列强加速瓜分中国，为独占中国、排除列强而提出的“中国保全论”又开始在日本兴起，犬养毅的“东亚会”、近卫笃麿的“同文会”都支持这一观点，甚至于“东亚同文会”纲领的第一条就是“保全中国”。

关于当时日本的“大亚洲主义”，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也有所关注，如章太炎于1897年发表的《论亚洲自为唇齿》，以及1919年李大钊的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》。

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霸权文化，也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。今后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，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，就在你们日本国民的慎择。

——孙中山《大亚细亚主义》

3. “中国瓜分论”

1918年一战结束后，日本是战胜国，在中国获得了大量利益，成为了国际联盟五大国之一；日本成为了“列强”之一，但遭到了英美的排挤，日本认为这是对自身的不公平。1918年，近卫笃麿之子近卫文麿发表了《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》。近卫家族是天皇所封的贵族，有权参政，近卫文麿也因其父亲身份而很早就进入了政界，在其中平步青云，历任贵族院议员、副议长、议长，第34、38、39任内阁总理大臣。

当然，当时日本的实力还未及英美，因此日本国内也有以币原喜重郎为代表的一派主张“协调外交”，与西方缓和。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田中义一上台后，日本开始推行对西方的强硬外交，甚至在之后退出了国联。

（二）“大东亚共荣圈”

20世纪20年代之后，日本的扩张遇到了两大阻力。第一是中国的民族主义：1928年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民族工业近代化开始，反日抗日情绪逐渐高涨。第二是西方列强的抵制和排挤，如1924年美国的“排日移民法”。

由上述两大阻力，在30年代后，日本决定从“脱亚入欧”转向了“排欧入亚”。1937年，近卫文麿上台，宣告建立所谓的“日满华东亚新秩序”；1942年，日本宣布建立“大东亚新秩序”，将其范围扩大到东南亚。在具体方针方面，日本采取南进政策。1940年9月，《德意日同盟条约》签订；1941年4月，《日苏中立条约签订》；10月18日，东条英机内阁成立。

在很大程度上，“大东亚战争”的名称来自于其发生的地域。在当时的日本，还设有“大东亚省”，供日本各傀儡政权内部会晤商谈。

二、“维护国体论”

（一）稳健派登场

1943年起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反攻；5月的阿留申群岛战役与7月的塞班岛战役对日本军力与士气造成了重大打击。1944年7月18日，东条内阁辞职；22日，小矶国昭上台，提出“保卫成果的和平论”，但盟国并未接受。1945年4月1日，美军攻占冲绳岛；5日，小矶内阁下台；7日，军部的铃木贯太郎上台，其迫在眉睫的事务也是求和。当时，日本的军部在寻求“本土决战”“一亿玉碎”；外务省则在寻找外交突破口，其一个方案是寻求苏联的斡旋，但彼时苏联已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了对日开战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之时，外务省出身的东乡茂德、近卫文麿、吉田茂等稳健派文官开始涌现，他们提出“维护国体论”，即维持战后日本的天皇制。他们认为应尽快结束战争，一方面是针对主张“本土决战”的军部，另一方面是针对日渐壮大的日本共产党势力。

1945年2月，近卫等人上书天皇，认为“在维护国体方面最值得担忧的不是战败，而是因战败而可能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”。稳健派的主张得到了天皇支持；此后，天皇逐渐由支持军部转为支持稳健派文官，终战处理工作的主导权也被稳健派掌控。

（二）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投降

7月26日，中英美发表“波茨坦公告”，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。

政府不认为（公告）有何重大价值，吾等惟有将战争进行到底。

——铃木贯太郎内阁

8月6日，广岛原子弹爆炸；8日，苏联对日宣战；9日，长崎原子弹爆炸。14日，在稳健派的支持下，天皇召开“御前会议”，讨论投降事宜；15日，天皇宣读“终战诏书”。在天皇宣布投降后，日本上下陷入了一定时期的混乱，军部要求从稳健派手中“夺回天皇”，也有军部成员集体自杀；日本民众也对此感到迷惑。

日本投降后，军部已不成气候，近卫文麿等部分政要也被判为战犯。17日，东久迩宫稔彦组建了临时内阁。在此后日本的混乱时期内，稳健派与盟军驻日司令部的人员站了出来，成为了压制混乱、重建国家的重要力量。